

我国及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模式 研究资料选编



山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

(一)

- 1、八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综述.....俞 革 (1)
- 2、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冷静思考
——刘国光经济改革思想述评.....杜 辉 (9)
- 3、评王琢的改革理论.....矢吹晋 (16)
- 4、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模式.....郑英潮 (24)
- 5、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新体制的框架结构.....林 凌 (36)
- 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框架若干模式的探讨.....周起凤 (39)
- 7、中国经济体制中期 (1988—1995) 改革设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纲要”课题组..... (41)
- 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期规划课题组..... (59)
- 6、近期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曾国祥 (64)

(二)

- 1、关于“苏南模式”的研讨.....胡学来 (72)
- 2、“苏南模式”的危机与选择.....郭晓鸣 周如昌 张红宇 (75)
- 3、政治、经济、社会：对温州模式的再考察.....余炳辉 (81)
- 4、“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李宗金 (92)
- 5、一种新型的农工商共同体——大邱庄模式.....冯兰瑞 (93)
- 6、“石家庄模式”的理论思考
——生产资料流通的市场化之路.....赵 炯 (100)
- 7、“青岛速度模式”的思考与研究.....郭先登 (102)
- 8、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邓必海 (105)
- 9、中国开放经济模式的选择.....赵瑞彰 (110)
- 10、我国特区发展的新阶段及其目标模式.....苏彦汉 (115)
- 11、中心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成就与经验.....邱靖基 陈佳贵 (122)

12. 我国第一家集团所有制企业——蛇口集团调查
.....安 佳 刘玉华 崔茂森 郭继良 (126)
13. 重汽：发展企业集团的第二种模式.....企业集团问题联合研究组 (131)
14. 试论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良模式
——农户自愿组合，耕地连片经营.....黄日生 五 华 (141)
15.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探讨.....方 承 (147)

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模式

1. 论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葛霖生 (151)
2. 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百慕大三角”..... (160)
3. 东欧几种经济改革理论模式的比较.....王至元 (164)
4.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和改革智囊人物.....王晋军 (167)
5. 八十年代波兰经济体制改革述评.....刘积高 (181)
6.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体制改革.....樊克恭 (185)
7. 八十年代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宣杏云 (189)
8. 近年来民主德国经济体制的新发展.....白晴宸 (194)
9. 保加利亚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展..... (197)

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

1.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王洛林 (204)
2. 奥塔·锡克教授谈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柴 野 编译 (210)
3. 对中国、苏东经济改革的比较评述..... (212)
4. 中苏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毛容芳 (216)

八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综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俞 萃

1987年初,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过8个年头之际,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要回顾总结几年的改革,研究今后改革的思路。^①经济学界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认真反思,肯定了几年来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认清了改革的难点和复杂性,并提出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

一、八年改革的基本成绩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8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 and 目标是完全正确的。8年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的稳定增长,使我国经济进入了建国以来发展生机最旺盛、国力增强最快和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1、我国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在农村,主要是实行以户为主的联产承包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改革流通体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主要是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和发展各种市场,鼓励企业开展竞争;同时相应改进宏观管理,注意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促使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通过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以下显著变化。

第一,随着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企业活力明显提高。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和基层经济单位,基本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和统收统支、集中分配的经营方式,企业实际上是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责权利严重脱节,经济效益很差。改革以来,农村98%的农户实行了以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发展了承包、租赁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以及一些单位相互参股、联合经营的形式。目前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已占60%左右。并且在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全民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发展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些改革,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既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的权益,又加强了企业的责任,使企业经营意识、竞争观念和开拓精神都显著增强。

第二,随着国家指令性计划和统一定价范围的缩小,市场机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过去,我们过分强调指令性实物计划的管理,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经济运行机制僵

^①国家体改委综合试点组:《认真回顾总结,深入推进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125期;《安志文、高尚全在十五省市体改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理论信息报》1987年4月6日。

化。改革以来，大幅度减少了国家直接计划管理的产品，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①到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已从120种减到60种，占工业产值的比例从40%缩小到20%。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商业部计划管理的商品从188种减少到25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由于市场的不断发展，价值规律在促进供需衔接、调节供求方面的作用增强，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三，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经济建设资金已由财政渠道为主转为信用渠道为主。在原有体制下，国民收入再分配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渠道进行的，经济建设资金一般是采取无偿拨款办法，吃“大锅饭”现象严重，资金使用效益很差。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国家可以支配和计划使用的资金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并没有下降（1978年为39.5%，1986年为39.7%），但通过财政渠道和信用渠道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7.2%下降到25%，银行新增存款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3%上升为14.7%。投向生产建设和流通的总资金中，由财政渠道开支的已从76.6%下降到31.6%；由银行渠道解决的，已从23.4%上升到68.4%，经济建设资金无偿供应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金融手段开始在调节社会总需求、促进生产建设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逐步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四，随着对外经济技术联系的扩大，封闭型经济开始向开放型经济转变。过去，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排斥外国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严重束缚了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指引下，局面已有很大改观，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一条以沿海为前沿、逐步向内地延伸的开放地带，取得了重要进展。到1986年止，共向国外筹措资金200亿美元，引进技术1万多项，开办了7700多个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进出口贸易比改革前增长了两倍多，出口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5.6%提高到1986年的12%。对外开放度在短短几年内有了成倍增长，对外开放在我国经济中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②

有的同志将8年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这阶段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城市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试验性的改革。第二阶段，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开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阶段。几年来，改革在以下12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2）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激发了城乡经济的活力；（3）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了生产经营活力；（4）对计划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市场机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5）改革了流通体制，使商品市场迅速发展；（6）改革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7）对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8）改革了财政、税收体制，发挥了税收的调节功能；（9）改革了金融体制，发展了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建设与改革研究课题小组：《对几年来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反思》，《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方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第7期；严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展望》，《人民日报》1987年6月12日；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财政经济》1987年第9期；徐景安：《改革的反思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124期。

资金市场；（10）进行了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功能；（11）实行对外开放，扩大了同世界各国经济技术贸易关系；（12）进行了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的部分改革。①

有的同志将8年的改革划分为三个时期分述改革取得的成就。第一个时期（1979—1980年），通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业生产多年停滞不前的状态。同时，城市改革开始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并通过利润留成制度和财政“分灶吃饭”等措施，在扩大企业、部门、地方财力和自主权等方面开始迈出步子。第二个时期（1981—1983年），是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通过砍基建项目和控制银行信贷，把过份膨胀的需求压了下来，出现了部分买方市场和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同时，注意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出现了五业兴旺局面。第三阶段（1984—1986），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全党在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问题上认识达到一致。②

还有同志认为，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除取得上述成就外，还有很多难以从统计指标上，从定量上看出变化。例如，（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不仅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洋务运动以后百多年来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就是在这8年里初步奠定的。（2）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现代经济的规则、信号系统机制得到很大发展，如价格、利率、汇率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从人们对此基本没有认识到认识得比较深刻。（3）我国的企业家阶层，与经济有关的知识阶层迅速形成、发展。他们的作用、影响、观念，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4）中国经济走向了世界，而且比较全面，从商品、劳务到金融、科技；另一方面，是外国的资金、技术、管理进入中国。这使我们对世界经济的无知、半无知状态正在结束。（5）全民族的现代意识得到开发。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与世界经济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认识到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就不能排斥与市场相关的经济范畴。③

2.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8年的改革，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

第一，促进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农、轻、重的协调发展。在一二三产业中，过去长期严重落后的第三产业有了较快增长。三大产业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30.8：48.2：21，变为1985年的29.8：44.5：25.7。农、轻、重关系也由过去那种畸重畸轻的状况趋于协调，比重从1987年的27.8：31.1：41.1变为1986年的34.1：31.5：34.4。旧体制下长期存在的消费品供应全面匮乏现象有了很大改变。能源、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的状况，除电力仍很紧张外，一般也开始缓解。

第二，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发展战略的失误与经济体制的僵化，我国国民经济一再出现大起大落的不正常现象。8年来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战略的转变，使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农村的改革增强了农业自身的“造

①高尚全：《希望之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展望》，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8页，《我国八年改革获得大成就》，《人民日报》1987年6月3日。

②吴敬琏等：《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反思与选择》，《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9期。

③朱嘉明：《对八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评价》，《经济日报》1987年4月4日。

血”机制，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经济结构的初步调整，为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选择；财政、金融等间接调控手段的增加，避免了“急刹车”可能造成的经济大起大落。1953—1978年期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7.9%，并不算慢。但其中最高年增长32.7%，最低年竟下降33.5%，分别偏离平均速度达+24.8和-41.4个百分点；1979—1986年期间，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10.1%，其中最高年增长16.5%，最低年增长4.6%，分别偏离平均速度为+6.4和-5.5个百分点。这说明近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大大提高了。

第三，促进了宏观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改革使经济效益不高的情况开始有了好转。诚然，如果仅从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百元产值利税率来看，1978年为25.6%，1986年为23.7%，效益似乎是下降的。但这里存在许多不可比的因素，如利率提高、折旧率上升、农产品原料涨价，以及职工工资奖金补贴和各种摊派增加等。仅剔除折旧率和利率提高两个因素后，1986年产值利税率就提高为25.4%，已与1978年持平，如再剔除其他因素，效益比1978年有所提高。此外，按社会总产出（国民收入）占社会总投入的比重计算，1978年为34.4%，1986年为36.5%，提高了2个百分点。综合能源消耗系数，1986年比1978年约降低了30%。这些指标都反映出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四，促进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按可比价格计算，1986年比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长了95%，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98%，部门、地方、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增长了3.8倍。电力、钢、煤炭、石油的产量，分别从占世界的第七、五、三、八位，上升到第五、四、二、五位。

第五，促进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8年的改革，结束了城乡人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86年和1978年相比，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24元，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从316元增加到828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160%和80%以上。同时，8年共安排城镇人口就业约6000万人，待业率从5.3%下降到2%；农村有7000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并开始向小康阶段迈进。^①

二、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8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一些同志将这些问题从不同角度作了归纳。

有的同志认为，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企业的微观机制难以合理，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还不够。企业改革的难点，一是企业怎样自负盈亏，二是使企业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如何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保证企业行为合理化的自我制约机制。（2）市场体系的作用受到限制，原因是各种经济参数不确定和各种经济关系未很好理顺。（3）宏观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宏观控制弱化，调节缺乏手段和经验。（4）改革面对着一个并不宽松的环境，这几年社会总需求与总供

^①见《我国八年改革获巨大成就 社会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光明日报》1987年8月3日；《八年改革 成就重大》，《经济日报》1987年6月4日；严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展望》，《人民日报》1987年8月12日；方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第7期。

给的平衡问题没有解决好,经济一度过热,供应紧张,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限制,加上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使我们只能在不大宽松的环境中进行改革。①

有些同志将这些问题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1)国民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传统发展模式 and 传统体制模式中存在的扩张冲动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并突出表现为:财政还有赤字,银行信贷规模偏大,物价水平的上涨虽有控制但基础不巩固,这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2)没有真正解决传统模式中经济效益普遍低下的问题。在农村,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整个农村经济资源的利用并不理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关系到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益,而价格不合理限制了结构的合理调整,分散经营又限制了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农民对农业生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农田水利设施和大中型农机具破坏多而建设少。城市工业中,还是重产值轻效益;能源上去了而加工工业上得更快,使缺电、缺运力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产品质量提高和品种变化赶不上消费需求 and 消费结构的变化;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赶不上技术陈旧的速度;外贸亏损严重,换汇成本不断上升。从中长期发展看,由于不注重投资质量,将会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3)没有解决好搞活企业和改善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这几年,通过简政放权,企业比过去活了;通过价格改革、调整税率、利率、汇率等,改善了在经济运行中利用市场机制的外部条件。这使得企业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利润动机有所增强。但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还缺乏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的机制,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意识不强,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差,出现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倾向,企业只能负盈不能负亏的问题开始突出。②

也有同志将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1)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一方面,建设规模太大,经济生活绷得太紧,给改革留的余地很小;另一方面,改革如何有利于保持经济平衡、促进结构的合理化,路子还不够明确。(2)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放开不相适应。地方和企业权限扩大后,预算外资金增加,但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还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引导制度;个别年份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长还缺乏合理和有效的控制办法。(3)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建立新经济体制基础的目标要求过急;有些改革措施在出台时对经济环境和可能产生的副效应考虑不够,步子大了一些;还有的改革存在着“一刀切”、一哄而上和具体政策多变的问题等。③

有的同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指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微观经济方面,企业的活力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远远未能正常发挥出来。国营小企业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具有了自主经营的能力,活力有所增强,但政府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在大中型企业还没有很好落实,出现了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够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问题。此外,价格体系严重扭曲的状况远未消除,市场体系不完善,生产要素流动仍有障

①高岗全:《希望之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6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建设与改革研究课题小组:《对几年来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反思》,《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

③严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展望》,《人民日报》1987年6月12日;另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第7期。

碍,不能开展充分竞争,难以形成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随着简政放权,国家逐步减少对微观经济直接控制的范围,但间接经济手段尚不能有效的运用,这曾造成宏观经济的某些真空状况。1984年第四季度到1985年上半年发生的投资、消费、信贷和外汇收支的某些失控及由此带来的工业超速增长,市场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等经济过热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缺少完备的法规体系和执法制度,有些政策界限也不够明确,使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较多的漏洞,助长了某些不正之风。^①

有的同志则从微观经济方面指出改革存在的问题:一是改革以来,主要采取简政、放权、让利来搞活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不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让利已难以进行下去。二是改革以来,比较重视搞活企业,提高微观经济运行效益,但由于不注意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益,使企业规模效益未能实现。^②

有的同志在分析现象的基础上,寻找问题的根源。认为,从现象看,目前的问题表现为:一方面,经济效益不高,总需求过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财政、外汇、信贷的平衡有较大困难,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另一方面,改革实际上难于走出大的步子,只能采取局部性行动。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运行中的经济体制存在由双重体制胶着对峙产生的漏洞太多、摩擦太大等弊病。^③

还有同志从更广义的角度对改革提出10点意见:(1)中央已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缺乏一个实施改革的总体方案;(2)改革的决心大、动作快,但准备不足;(3)对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为扩大战果创造条件却不够;(4)实行职工劳动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缺乏科学的具体办法;(5)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对的,但如何增强企业活力的基本思路及做法尚需斟酌;(6)从理论上明确了我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体制上如何实现它,还未很好解决;(7)企业要自主经营,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这些要求都是正确的,但还需要为此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8)确定改革的总目标,需要考虑企业活力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这两个约束条件,但往往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9)对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完善经济运行机制和改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这两大问题,也往往强调前者,忽视后者;(10)对策研究严重落后于理论研究,使正确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付诸实施。^④

三、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大家一致认为,过去几年的改革,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和路子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目前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倒退到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统收统支、工资踏步、物价冻结、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凭票供应、生活艰难的老路。对前几年的改革进行回顾总结,正是为了指出

①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财贸经济》1987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六五”经验研究组,《对“六五”时期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②徐景安:《改革的反思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124期。

③吴敬琏等:《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反思与抉择》,《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9期。

④孙汝良:《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十点反思》,《理论月刊》1987年第9期。

进一步前进的方向。

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思路，经济学界进行了讨论。由于对经济形势和体制改革形势存在着不同的估计，因而对今后的改革思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各有侧重。

有的同志提出，今后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促使新体制尽快占据主导地位。为此，要处理好以下12个方面的关系。（1）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2）正确处理搞活企业、发展市场和实现间接控制这三项改革任务的关系，把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的改革引向新的阶段。（3）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使两者互相渗透、结合、保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4）正确处理微观与宏观的关系，使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更好地结合起来。（5）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以及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调动广大群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6）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7）正确处理多样化和规范化的关系，加强对改革的分类指导。

（8）正确处理近期与中期目标模式的关系，使改革有步骤地配套地进行下去。（9）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与增产节约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10）正确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搞活的关系，使两者互相促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1）正确处理经济改革与经济立法的关系，巩固和保护改革的胜利成果。（12）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迎接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全面改革的新时期。^①

有些同志指出，今后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1）在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求得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利于体制模式的平稳转轨。在稳定经济方面，从短期看关键仍在控制总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由于经济体制处于转轨过程之中，导致需求膨胀的因素既和中央财政预算有关，也和地方、部门、企业有关，因而需要改进控制的艺术和方法，不但要压缩需求，实现现阶段的经济稳定，而且要把短期稳定同长期稳定统一起来，争取长期高效稳定发展。（2）坚持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一切从提高经济效益出发来安排生产和建设。首先是以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中长期投资质量来推动整个经济结构进步；其次要加强短线产业和基础结构的建设，并尽可能使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同新的、更高收入水平的消费结构相适应；再次是尽快制定出包括带头产业、优先发展产业、支柱产业、创汇产业等在内的完整的产业政策，并与进出口政策相结合规划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3）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以重新塑造微观经济基础为中心环节，处理好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形成和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转换的关系。在深化企业改革中，第一，要把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从放权让利转变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上来。第二，要把转变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作为企业改革的主攻方向。第三，转变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同改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要相衔接，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换进行配套改革。至于转变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具体形式，小型国营企业可以采取租赁、承包等，对大中型国营企业可以采取经营目标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及利润递增责任制等。^②

^①高尚全：《希望之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87—8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建设与改革研究课题小组：《对几年来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的反思》，《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

有的同志认为,应该首先治理环境,然后配套改革。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不能有效运行的双重体制,其中,新体制的个别环节单项突出,而它的枢纽部分——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则严重落后。因此,当务之急是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在这些落后的方面迈出一大步,争取新体制能尽快作为一个系统发挥主导作用。目前首先必须采取措施在短期内控制住总需求膨胀的趋势,造成一个财政有一定后备,出台大的改革措施也不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在环境治理阶段要同时加紧进行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干部训练、舆论宣传等准备工作,一旦总供给同总需求比较协调,改革即可迈出决定性的步子,实行有组织、分步骤的配套改革。由此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又会进一步改善经济环境。这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就会转入良性循环。①

还有同志认为,今后的改革在要注意改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1)改革与发展。坚持改革为发展服务,发展中的问题要靠改革来解决;(2)改革与效益。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益,有待于进一步改革;(3)目标与步骤。在实现改革目标上不宜过急,时间要放长一些;(4)关于“双轨制”。应通过加强管理,兴利除弊。近期内,可以推出以下改革:第一,加快住宅改革;第二,坚持价格改革;第三,改革投资体制;第四,推进企业改革;第五,改善宏观管理。②

有些同志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认真研究解决几个直接关系改革进程和前途的难点:(1)如何搞好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2)如何逐步完成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3)如何搞好投资体制的改革;(4)如何进行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的改革。③

有的同志提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经济理论界要做好以下工作:(1)反省对经济改革的各种理论。如科尔奈的理论、总供给总需求理论等,其局限性、渊源,搞清理论背景,发展中国的经济理论。(2)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3)搞好改革的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切身体会到经济改革得到的利益,看到必将得到的利益和会牺牲的利益,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4)正确判别对改革的各种议论。④

选自《经济研究资料》

①吴敬琏等:《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反思与选择》,《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9期。

②徐景安:《改革的反思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124期。

③严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展望》,《人民日报》1987年6月12日。

④朱嘉明:《对八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评价?》,《经济日报》1987年4月4日。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冷静思考

——刘国光经济改革思想述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杜 辉

刘国光同志自70年代末以来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诸如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目标设计、经济体制改革起点模式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环境等等。

一、清算与突破

正如刘国光反复强调的那样，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经济模式的一个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首先需要对传统理论来一个根本性清算。他自己就是在我国较早进行这种批判性研究的一位经济学家。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被传统理论搞得最为混乱的问题之一。1979年他就批评了把市场同自发性等同起来和把计划经济同自然经济混为一谈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主张。^①80年代初，他在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问题上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见解。第一，作为改革模式，他指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关系不应当是“板块式”的关系（即计划管一块，市场管一块），而应当是“互相渗透式”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渗透式”结合还应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计划调节部分含有市场因素和市场调节部分含有计划因素，另一种情况是整个国民经济不再分为两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在胶合成为一体的胶合体中互相渗透。第二，关于“胶合体”的实现方式，他指出，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宏观经济决策和微观经济活动的衔接渠道主要是有组织的计划协调和价格杠杆的自觉运用（第311—328页）。刘国光这两点见解，对于后来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计划与市场两者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等提法，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论证。

清算传统观念也应包括对已有的改革思想进行清理和创新。孙冶方同志是我国最早批判自然经济观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一方面坚持了孙冶方的观点，就我国传统体制究竟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问题与其他学者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他对孙冶方因当时条件的局限而形成的理论上的不彻底进行了清理。刘国光指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没有商品的价值规律，他所主张的企业自主权实际上是没有扩大再生产的企业自主权。刘国光在这种清理中自己也实现了观念上的飞跃和突破（见第405—431页）。

刘国光在总结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经验时，就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突破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1）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多样化，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2）确认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是越大越公越

^①见《刘国光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82页。以下凡引此书，仅在文内注明页码。

纯越好，而应是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的多样化发展；（3）确认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单一的计划调节，而可以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4）破除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探索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收入分配格局^①。

二、“五五”体制结构

经济体制模式的设计是经济改革工程的战略目标问题。刘国光在体制模式的内涵、模式的分类以及模式的选择等几个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经济体制模式的内涵，东西方学者争议不少。例如，格雷戈里（Gregory）和斯图尔特（Stuat）的“四特征”观点，林德贝克（Lindback）的“八面体”观点，以及纽伯格（Neuberger）和达非（Duffy）“三结构”观点等。这些学者将经济体制看成多种要素的组合，他们共同认定的要素包括产权、决策、动力、利益以及传导机制几个方面。刘国光吸收了这些合理见解，并结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较早地在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五种结构论（第490页）。他认为，经济体制模式应从五个方面（角度）去考察：（1）所有制；（2）经济决策；（3）经济调节；（4）利益和动力；（5）管理组织。这五个方面各自内部因素的不同组合形式构成了五个方面的结构状态。第一，关于所有制结构，他将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所有制组合方式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单一国家所有制的结构；二是社会或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结构；三是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并存的结构。第二，关于经济决策权力结构，他沿用波兰学者弗·布鲁斯的分法，将决策分为三层：国家宏观决策，企业经营决策，个人和家庭的就业、消费决策。这三层决策权如果全部集中在国家手中，为集权结构；如三层决策权分散化，基本上取决于企业和个人决策，为分权结构；此外，还有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中间结构。第三，关于经济调节结构，他认为有三种构成：直接的计划调节，间接的市场机制调节，中间形式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形式。第四，关于经济利益和动力结构，他认为主要可分为单纯政治动员、单纯物质刺激和两者相结合三种结构。第五，关于管理组织结构，他认为也分为三种：单纯行政管理、单纯经济管理和行政与经济管理方法并用等（第490—492页）。

刘国光认为这五个方面结构是经济体制中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之间的交叉组合形成某种模式框架。他从社会主义体制沿革中概括出五种体制类型：（1）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模式；（2）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3）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4）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经济模式；（5）“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前述模式要素在不同模式中有不同的组合方式，例如，第（1）类与第（2）类模式在决策权划分上的差别在于：前者大到国家预算、小到个人消费选择都听命于国家，后者至少在个人和家庭经济活动方面是自主地分散地进行的；在经济调节方面，前者对生产资料乃至消费品实行定额实物配给，后者至少在消费品分配上采取大部分自由买卖方式。又如，第（3）类与第（4）类模式之间，在产权关系上，前者仍以国营和集体企业为基础，后者则允许个体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一定发展；在决策权分割上，前者只有一小部分经营权放给企业，如部分产品自销权和利润留成等，后者则除了有关国家全局的重大决策，一般企业日常产供销、人财物基本上由企业自主决策；在经济调节方式上，前者以行政指令为主，后

^①见刘国光：《在改革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者则主要依靠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间接控制。按照刘国光的意见,第(4)类模式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从模式五种结构出发,进一步划分出五种体制类型,构成“五五”体制结构理论。比较而言,刘国光的体制类型分析有许多长处。例如,他的模式分类与美国经济学家阿兰·G·格鲁奇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四模式的划分较为接近,所不同的在于:第一,格鲁奇采用西方学者惯用的非规范式细节区分,看起来有些含混,不够明了;第二,格鲁奇将改革后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划入“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一类,而没有专门划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①就东方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的模式分类较早,也较为简明。但他的模式主要是相对于苏联式中央集权制管理体制提出的,主要在三个方面与传统体制根本不同:第一,在计划方面,中央只保留一切最终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各種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方面的指令性计划,其余下放;第二,在调节方面,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结构;第三,在利益方面,企业利益独立化,而向市场。^②锡克分类显然需要发展,因为它的最大缺陷是缺少中间环节或过渡形式。

布鲁斯分类和科尔奈分类也存在一些问题。布鲁斯早在6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就从经济决策角度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区分为集权型、分权型和利用市场调节机制的计划经济型(结合型,如匈牙利)。而科尔奈1985年来华时提出了按照经济运行机制角度划分体制模式的看法。他首先将经济运行的协调方式划分为行政协调(I)和市场协调(II)两类,每一类协调机制又划分为两种形式,一共四种模式,即直接的行政协调(IA)、间接的行政协调(IB)、无控制的市场协调(II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B),并将IIB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布鲁斯分类和科尔奈分类无疑都是从改革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简单明了,针对性强。然而,他们的分类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其一,刘国光曾指出,“我们在设计改革的目标模式时,既要考虑一种经济模式向另一种经济模式的转换,也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之间的继承性。”^③布鲁斯和科尔奈的分类更多地是一种理论抽象,几种类型之间缺少一种历史的联系,使人们难以从现实生活中把握模式的自然过程。而刘国光的模式分类不仅有历史起点——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也有从集中模式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模式过渡的中间阶段——改良型计划经济,并且这个改良型就是以匈牙利等国为背景的。比较起来,刘国光的分类更接近我国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其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从产权关系、决策、调节和动力机制诸方面协调配套进行。决策权的每一次分散,协调机制的每一次变动,都要求整个体制作出反映。尤其重要的是,布鲁斯和科尔奈都忽视了一个根本环节,那就是所有制的改革。事实上,决策权离不开所有权,没有所有权关系调整,便没有真正的分权;而运行机制改革如没有所有制的改革作基础,必然会产生双重交通规则混乱。在刘国光主持撰写的关于1985年“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中对此发表了明确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不仅需要解决经济运行机制中的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直接控

①见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9—531页。

②见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见刘国光:《在改革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制与间接控制等关系问题,而且必然需要解决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机制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和内涵的问题。ⅡB体制是以国有经济为对象、以国家所有制为前提的,它基本上未涉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及国家所有制内涵的变革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ⅡB体制会由于缺乏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或者国家所有制内涵的变革而难以实现。”^①在刘国光的体制类型中,每一模式中所有制结构都有相应变化,并与其它环节紧密呼应。这样不仅揭示了配套方向,也指出了模式转换的衔接问题,因而比较具体、全面,易于整体推进。

三、起点:“一个半”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怎样走,首先取决于人们对中国体制改革的起点模式如何估价。起点模式实质上就是基本国情问题。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原有的经济模式是苏联式的传统集中计划经济类型的模式。然而,刘国光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完全绝对地实行过地道的传统的苏联式的体制”(第502页);中国的起点模式基本上属于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类型模式,但同时带有明显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因素,或叫做“带有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因素的传统集中计划经济模式”^②。对此,波兰学者布鲁斯也同意,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不是ⅠA,可以说是半个ⅠA。”^③这样,根据刘国光的估价,中国改革的起点可以叫做“一个半”模式。

这种“一个半”模式除了具有苏联式集权模式的一般特征外,“在排斥多种经济形式上,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上,在排斥按劳分配原则上,我们做的都比苏联、东欧各国走得更远。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集中化程度、实物化程度、封闭化的程度、平均主义化的程度比他们更大”(第503—504页)。拿家庭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来讲,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职业选择是比较自由的,允许流动的;消费品的选择方面,除了两个战争时期实行配给制外,苏联大多数时期消费品是不凭证的,尽管他们时常供应不足,而在我国就业一向统包统分,至今职业难以流动;消费品分配上,我们长期把票证分配或限额分配当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这种连个人家庭选择权也集中起来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以上这些都是在苏联集权模式之外又多了一层军事共产主义影响的表现。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起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刘国光为我国设计了一个“中度”且又渐进的目标模式。1984年底,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刘国光把我国经济模式的改造方向归纳为五点:(1)确立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各种经济联合体等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2)确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开的,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多层次决策的经济决策结构;(3)确立加强指导性计划、主要运用价格等经济手段并利用市场机制的经济调节体系;(4)确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经济收入同经济效益密切联系起来的经济利益体系;(5)确立政企职责分开,以横向联系为主、以中心城市为枢纽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化经济组织体系(第529—530页)。这一模式比《决定》公布之前刘国光本人为我国设计的模式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那时,刘国光比较倾向于以计

①②③刘国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

划调节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第(4)类模式作为改革方向,他当时有“三个为主”:以国营经济为主,以国家决策为主,以计划调节为主^①。显然,这“三个为主”已不能成为今日经济改革的选择了,就是1984年底他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改革方案也不能说明今天触及国营企业“产权分割”的改革了。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点:

第一,改革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人们的认识总是逐步深化的,尤其对于一个多半生从事集中计划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需要整个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使如此,刘国光仍然是他这一代经济学家投身于改革的杰出代表之一,并且始终站在体制改革研究的前沿。1985年底刘国光关于所有制结构的研究已触及到国家所有制内涵的变革层次了。

第二,刘国光的模式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充分认识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提供的与其说是模式,莫如说是一种思想方法,这就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低,国情复杂,改革的路要长些,阻力会大些,目标只能分阶段逐步实现。他曾特别强调指出,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选择的经济模式,“各有各的历史背景,它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待它们”(第501页)。例如,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在战争年代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成功的;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于落后国家加快积累、迅速工业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效的。旧经济体制只有在生产、技术条件进一步改变时才显示出它的不适应性;同样,新体制的产生也要以新的经济温床为前提。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经济模式的选择,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分权,分权分到什么程度,一般要受四个基本因素的制约,它们是:(1)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结构的复杂化程度;(2)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含程度;(3)重轻农向农轻重的转移程度;(4)国民经济外向化程度。一般说来,生产力越高,结构越复杂,越益分权;发展目标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为主,方法以提高效率为主,越益分权;向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的农轻重发展次序过渡,越益分权;外贸及对外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越高,越益分权(第296—297页)。

我认为,刘国光这种尊重历史、尊重客观规律的思路,今天应格外引起注意。体制改革是客观规律的要求,人们可以顺应规律,推进变革,但不能超越经济演变的自然过程。正如人们不能在一天之内建立起一套发育完备的资金、技术、信息和劳动市场一样,人们也不能期望一个早上同时废止旧的管理方式,代之以新的体制。我们必须承认改革的阶段性、渐进性,必须承认近期、中期乃至长期方案的“可行度”的约束性。刘国光一再提醒人们,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起点上改革。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综合社会问题。两千多年的封建大一统观念、小生产平均主义意识等心理沉淀,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不是几个方案就可以革除的。纵观理论界,刘国光对中国的问题也许吃得更透一些,对经济改革的设计也许更为稳健和可行一些。

四、“买方市场”说

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下进行,是在一个宏观经济比较协调、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还是只能在供不应求的紧张

^①见刘国光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2页。

状态下进行,这是当前国内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买方市场”说是刘国光的一贯思想,最早见于1980年他写的一篇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文章中。当时他就提出:“使社会生产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建立一个消费者或买方的市场,是正常开展市场调节的一个前提条件”^①。从这开始,引出了国内理论界对买方市场的讨论。1983年他以《再论买方市场》为题^②,系统地解释了他的“买方市场”涵义。首先,他指出,买方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资本主义只有在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和萧条阶段才东西多,卖不掉;在其复苏和繁荣阶段许多东西也紧张,形成卖方市场;某些产品如石油有时也是卖方市场。其次,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买方市场只是指供略大于求,是有限的买方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买方市场根本不同。至于大出多少算做有限,他提出三条,一要大出一个必要的预防不测事故和比例不协调的后备;二要大出一个经常性的调剂余缺的周转性的储备;三要大出一个能够造成必要的卖方竞争的余额。

1985年,刘国光将创造一个买方市场的根据归结为两条:第一,新的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存在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第二,改革过程要有比较雄厚的物资和资金的后备,以便减少经济利益调整过程中的摩擦,在改革的初期尤其需要这样^③。

刘国光的“买方市场”说可以说是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早在1965年,布鲁斯就讲过:“决策的分权化,同不能保持一般市场均衡的那种过度紧张的经济,是不相容的。利用作为计划经济(分权模式)操作手段的、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在呈现出明显的卖方市场现象的情况下,是不完全可能的。……近年来在波兰,分权之所以迟迟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达到或多少保持均衡的成长条件上有困难”^④。科尔奈也说过,东欧各国改革中,当遇到困难而需要克服时,官员们往往本能地趋向于采取行政措施,这种临时性应急措施一旦出台,往往会由于不断出现短期困难使它成为永久性的通用对策。改革中的短期困难以及不恰当的解决措施,很可能危害改革的长期目标。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英国的凯恩克罗斯博士和联邦德国的埃明格尔教授根据英国、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严格控制物资分配的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验,特别强调消除过度需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⑤。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1984年到1985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高速和超高速增长势头,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增长过快,大大高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刘国光称之为“国民收入超分配”),超分配与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紧密相关,导致短缺加剧和物价上涨。刘国光认为,1984年以来宏观失控的原因主要是在新旧模式交替过程中两种运行机制之间出现的真空状态。当旧体制的某些直接控制手段放弃以后,新体制的间接控制手段又不能立即生效,于是一方面旧体制所固有的数量扩张、投资饥渴等倾向仍然强烈存在,另一方面在

①刘国光:《略论计划调节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11期。

②见《财贸经济》1983年第9期。

③见刘国光等:《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周报》1985年9月22日。

④布鲁斯:《波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关于若干一般问题的备忘录》,《汉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年报》。转引自布鲁斯等:《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期。

⑤转引自刘国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研究》1985年第12期。